

表 11.4 中國城市化的區域人口和都市統計 (1843–1893 年) /317

第十二章 現代中國：中華文明的社會主義探索

圖 12.1 1949 年以前的中國工業分佈 /347

圖 12.2 中國主要礦產資源分佈圖 /347

圖 12.3 1950 年代建成的主要工業中心分佈圖 /350

圖 12.4 1960 年代建成的主要工業中心分佈圖 /353

圖 12.5 一百萬人以上城市分佈圖 (1953–1981 年) /355

圖 12.6 34 個百萬人以上城市按主要城市功能的分類及其分佈 (1981 年) /356

圖 12.7 省際人口遷徙圖 (1966–1997 年) /357

圖 12.8 新城市年齡構成 (舉例) /359

圖 12.9 新城市當年人口的各年齡組性別比 /359

圖 12.10 新城市人口勞動構成 (舉例) /363

圖 12.11 1958 年後中國城市區域空間構成示意圖 /366

圖 12.12 南京都市區域聚落分類 /366

圖 12.13 北京市工業區分佈 (1986 年) /368

圖 12.14 中國經濟的轉型階段及市場化程度 /371

圖 12.15 中國三大都會經濟區 /375

圖 12.16 深圳市國內生產總值及其構成 /379

圖 12.17 轉型城市：深圳的空間及功能結構 (2005 年) /379

表 12.1 中國總人口和城市化比率 (1948–2004 年) /351

表 12.2 新城市人口男女比例 (舉例) /360

表 12.3 1953–1975 年中國的人口遷移 (估計) /360

表 12.4 三個特大城市對全國主要工業產品的貢獻 /362

表 12.5 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時期的城市化特色比較 /373

表 12.6 三大都會經濟區主要經濟數據及在全國位置 (1999 年) /374

表 12.7 深圳市主要指標年平均增長速度 (1980–2006 年) /378



序

對「中國城市文明史」的構建，我走過了漫長的五十年。

唸中學時，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是我最喜歡的兩個學科，但入讀香港大學時卻選了地理為主修科，當時我認為地理較為經世致用，畢業後比較容易找工作。不過，我仍選了中國文學為副修科。在唸碩士和博士時，我的興趣由經濟地理慢慢向城市地理傾斜，但我對研究中華文明的興趣從未減退。

畢業後，城市的教學與研究便成為我在香港大學的主軸。在 1980 至 2019 年間，我出版了多本有關著作，即：《中國的大都市》、《香港與澳門》、《北京：由傳統國都到社會主義首都》、《香港發展地圖集》、《澳門五百年：一個特殊中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中國城市及其文明的演變》、《清明上河圖與北宋城市化》和《西方古城市文明》。

近二十年來中國考古的新發現加深了我對中華文明研究的興趣，我更讀了不少中西方和南北美洲考古與文明史研究的著作，及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中國史》和《中國古代史》。這些閱讀使我有兩點得着。第一，我逐漸感到一個國家的歷史，實乃該國文明的演變歷程，而城市就是文明最重要的發展動力和載體。因此，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即城市角度，看歷史和看文明，或從空間上敘述歷史和文明。第二，我發現對於中華文明的源起，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演變，和世界其他文明相比有何特色，以及在未來的世界它將會有何貢獻等問題，現有的出版物仍沒有足夠的回應，我們有必要對它們進行系統的分析與理解。這兩個體會就是我寫此書的動機。

當我在 2019 年 6 月開始撰寫本書時，香港發生了自 1997 年回歸祖國後的最大，且為時最長的以反共和促「港獨」為目的的動亂。至 2020 年 1 月底，這個動亂更疊加了新冠狀病毒肺炎疫症，使香港逐步出現停工、停課、停止娛樂和大型活動，以及進出境要檢測和作 14 天醫療觀察隔離，旅遊業和商業近乎停頓等百年未有的新情況。2019 年 12 月 1 日，武漢出現了首宗新肺炎個案。12 月 31 日武漢市向媒體宣告出現了不明病毒，宣佈確診 27 病例，並呼籲帶口罩，同時亦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有關情況。2020 年 1 月 1 日北京派出專家組到武漢，並於 1 月 8 日證實了新型冠狀病毒是新肺炎致病原因，有關情況及病毒基因排序等亦同時上載到世界醫療專業界公開資訊網站。1 月 20 日中國專家肯定病毒會人傳人。1 月 23 日中國實行了對疫區社會隔離和「封城」，而全國各地開始派出醫療隊到武漢支援。經過兩個月的嚴格「封城」和全國醫療力量的集中援助。到 4 月中，武漢及中國大陸其他地區的疫情已經受控，受感染人數約八萬，死亡個案約 3,300 例。近月每天新增感染的數字更維持在個位數。

反觀歐美國家，它們在 2 月中時才出現零星受感染案例，但到 4 月 16 日全球總案例已達 200 萬，總死亡人數約 13 萬，這些數字近八成是出現在歐美的。美國第一宗確診出現在 1 月 21 日，病人在 1 月 15 日來自武漢。美國因而在 1 月 31 日起禁止由中國出發的非美國國籍人士入境。3 月 2 日美國確診病例仍只有 80 宗，總統和副總統都宣稱疫情對美國影響不大。不過一星期後，總統宣告進入戰時狀態，全國學校停課，大部分商舖停業。兩天後全國 50 個州都出現確診個案。3 月 26 日，美國已成為確診個案最多國家。4 月 24 日，美國共有 889,309 宗確診，死亡 50,256 人。至 6 月 20 日，全球已有 188 個國家和地區出現疫情，確診共 862 萬，死亡 45.8 萬，美國排名第一，確診 226.5 萬宗，死亡 12.1 萬人。中國排名降至第 71 位，確診 83,352 宗，死亡 4,634 人。

疫症沒有國籍，也沒有國界，但對疫情的處理，不但是政策上的，還是個人行為上的，都反映出不同的文明背景。中國在疫情初發時，武漢

地方政府雖然有輕率和失誤，但在中央的指揮下，全國各地同心協力，能夠在兩個多月內控制了疫情，在 14 億龐大人口和春運人員來往頻繁的壓力下，全國只有四千多人死亡，總發病數也只有八萬多，絕大部分都集中在武漢一市。當中國確認疫症的存在和人傳人傳播後，不但在國內上下同心，分享經驗，努力阻止傳播面及採取有治療方法，也向世衛組織和各國分享，更向其他國家，特別是疫情嚴重的歐洲國家和防疫資源缺乏的發展中國家，提供醫療人員與物資的援助。

反觀美國，人口只有三億，經濟及醫療設備水平遠高於中國，又有中國疫情先例的警示，卻在三個月內，確診數由 80 增到 226 萬，增加了二十多萬倍，死亡超過 12 萬人。歷史上曾有多少文明在應對自然挑戰（疫症也是自然挑戰的一種）時，因不合時宜而湮滅了。我國今次對疫情的應對是成功的，有說它體現了我國制度或體制上的優點。其實它是體現了更高層次的中華文明的優點，主要是儒家的道德和倫理觀（仁、義），集體意識和以人為本等理念。在這節點上，美國學者福山（《歷史的終結》作者）為我們指出了中國、南韓和日本的「政府的效能」對三國控制疫情的關鍵性，而不是它們的體制上的作用，因為他深知這三個國家奉行了極不相同的政治體制。因此，福山看到了中日韓「有能力的強政府」的共通的表象，但說不出它背後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其實很簡單，因為三者都源自同一的中華文明。

3 月 13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致電歐盟主席，就疫情向歐盟各國及其人民致慰問。他說：中方堅定支持歐方抗擊疫情，積極提供援助，同時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願同歐方合作，保護世界人民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但在同一時間，美國政府卻在世界多處搶奪別國在運的疫情醫療物資，國內聯邦政府與地方的州政府在醫療資源和「封城」等政策上又互相推諉，州與州之間更對有關醫療用品囤積和搶購。4 月 14 日，美國更宣佈停止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財政支持，認為世衛組織抗疫不力，做成美國疫病大爆發，又怪責中國沒有管控好疫情和隱瞞事實，令病毒傳播到美國。



導言

文明、城市、歷史與中國特色

2020年6月1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視頻會議上書面致詞。他說：「我們願同合作夥伴一道，把『一帶一路』打造成團結應對挑戰的合作之路、維護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進經濟社會恢復的復甦之路、釋放發展潛力的增長之路。」這確實是中華文明的「禮儀之邦」的寫照。它定能一如既往，讓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克服困難的挑戰，走向和平、和諧相處與共同發展。

回顧我中華文明史，當窗外風雨聲大作時，我強烈地感覺到，中華各族人民在五千年來從所經歷的無數艱辛所積累出來的睿智，實可以「寧靜致遠」，為中國及世界和平發展再創輝煌。

薛鳳旋

2020年6月





中國被公認是唯一仍然存在的古文明，及唯一一個有五千年延續不斷歷史的文明。在差不多同時在地球上出現的其他三大古文明，即兩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河文明，已在「文明衝突」與「文明失敗」中，或因不能有效應對大自然的變化，或因外來勢力的侵襲，或因這兩種力量的互動而消失，早已被其他次生文明所取代。因此中國文明是世界文明發展史上的特殊案例。與中國文明一起延續的，自然也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不斷擴大與發展的歷史。而城市不但是文明出現的標記，也是文明最重要的載體，文明的演變亦因而往往在城市結構、功能和城市的空間分佈中體現。正因如此，對中國這五千年文明和城市發展的理解，是理解中國歷史和人類文明史的重要一環。這便是撰寫這本書的基本目的：把中國文明、中國城市發展和中國歷史系統且有機地整合，讓國人了解國家和民族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並以「中國城市文明史」為其書名。

要理解此書的寫作主軸，首先要清楚了解文明、城市和歷史這三個概念的定義，及釐清它們之間的關係。

文明的定義

在學術界的討論中，「文明」與「文化」這兩個詞常常被互換，有時甚至被認為是共通詞。

在西方，文明（civilization）一詞源於拉丁文“civilis”，有「城市化」和「公民化」的含義，引申為「分工」、「合作」，即人們和睦地生活於「社會集團」中的狀態，也就是一種先進的社會和文化發展狀態，以及到達這一狀態的過程。其涉及的領域廣泛，包括民族意識、技術水準、禮儀規範、宗教思想、風俗習慣以及科學知識的發展等。文明擁有更密集的人口聚集地，並且已經開始劃分社會階級，一般有一個統治精英階層和被統治的城市和農村人口。這些被統治的人群依據分工集中從事農業、採礦、小規模製造，以及貿易的行業。

「文化」(culture)這一詞在西方最早由古羅馬哲學家定義，原意是一群共同生活在相同自然環境的人類，在其發展過程中積累起跟自身生活相關的知識或經驗，所形成的約定俗成潛意識的外在表現，使其適應自然或周圍的環境。它包括了文字、語言、建築、飲食、工具、技能、知識、習俗、藝術等。簡言之，「文化」乃一個民族的生活形式。在考古學上「文化」指同一歷史時期的遺跡、遺物的綜合體。同樣的工具、用具、製造技術等是同一種文化的特徵。當猿人演化成為智人，懂得打製粗石器，便有最原始的「文化」。因此「文化」自一百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便已開始出現，但當時的人類以近親組成團夥，或穴居或四處遊蕩，以採集和漁獵為生，稱為舊石器文化。

約在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人類開始走出洞穴，在山坡建屋定居，發展農耕，馴服家畜、家禽，在大家庭基礎上形成氏族；他們需要分工和合作以有效地適應天氣的變化和河水漲退等有規律性的自然變化（也包括了突變），促進了氏族社會初步的階級分化和功能專業化，也促進了對自然、神祇和祖先崇拜的初期宗教，和達到一定豐收，以致能有剩餘價值的累積。

到新石器時代晚期，權力和財富的更大集中，使大量人力可組織起來在肥沃的河谷平原建造大型灌溉系統，產生了更大的農業剩餘，催生了遠途貿易和文字記錄的需求，更多人脫離農業，加入了手工業及服務業，使社會分工與階級分化更為複雜，而這個新社會的管理團隊，通過宗教和意識形態的威力，不但控制生產、基建和社會財富，更逐漸脫離氏族的血緣關係，成為貴族。這些質變使一些原始文化跨過了文明門檻，成為古文明。

文明社會擁有更密集的城市化人口聚集地，並且已有複雜社會階級，有一個中央集權的統治精英階層、書寫系統、被統治下的城市勞動分工，以及農村人口和通過稅收與力役達到的農業剩餘和財富的集中。在文明社會裏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裏，產生了有組織的意識形態，如宗教與祭祀、巨大的禮儀性建築，如宮殿與神廟。國家也在此時形成。較具體和系統地看，文明包括了三個層面的元素。最高層面的是價值觀（包括宗教、習俗），第二個層面乃制度（行政、經濟、法律、軍事等），第三個層面乃器

物（包括建築、文學、藝術等）。文明出現後人類對自然的控制力大大提升，並且在空間上向文化發展水平較低的周邊地區延伸。

對於「文明」和「文化」的區別，19世紀的德國學者認為：「文明」是指一個社會的技巧、技術和物質因素，而「文化」是指一個社會的價值觀、理想、藝術性和道德性。後來的西方學者卻把「文化」指向原始的、一成不變的、非城市的社會，而「文明」是指向更複雜的、發達的、城市的、動態的社會。當代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把「文明」看得更高、更宏觀，認為「文明」是人類最高的文化歸類。這些看法可以回歸到18世紀法國學者首次提出「文明」這概念時的最原始卻也是最實際的說法：「文明」是相對「野蠻狀態」的，即：「文明」是定居的、有城市的、識字的。

其實這個質樸的「文明」概念，在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已經出現，當時的希臘城邦把馬其頓視為野蠻人，將他們排除在泛希臘的運動會和祭祀活動之外。在中國公元前14世紀的甲骨文也顯示了商朝與周邊的「文明」與「野蠻」的分別。

文明出現的判定標準，一般認為主要是城市的出現、文字的產生、國家制度的建立。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是城市的出現，也就是說一種非農業人群的聚集，因而城市是文明的標誌。社會學家路易斯·亨利·摩爾根（Morgen, 1887）將人類社會演化分為蒙昧（savagery）、野蠻（barbarism）及文明三個階段，以技術發明作為各階段的分界，他認為文明階段的代表性技術發明是標音系統及文字。不過也有學者認為不能單純用文字來界定一個社會文化是否進入文明，因為農耕方法的改變，勞動的分化，統治階級，也就是中央集權政府的出現以及社會階層的出現都是文明產生的重要特徵。

至於如何導致中央集權的出現，哲學家 and 人類學家有多個不同的理論。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卡內羅（Robert L. Carneiro, 2003）提出環境與社會的限制理論，認為由於地理環境的影響，例如山脈、海洋對人類的阻隔，才產生了文明。由於人口增長而沒有擴張的餘地，使人類開始爭奪稀少的資源。這樣就導致社會內部出現了階級，由統治者控制稀少的資源，



同時對外部也就有了擴張的需要，這些都需要有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嚴密組織。卡爾·威特福格爾（Wittfogel, 1957）是灌溉系統理論的支持者。他認為新石器時代的農民認識到洪澇災害雖然會毀壞莊稼，但是也能提供更加肥沃的土壤，因此開始修建水壩，用儲水來灌溉農田。隨着灌溉需求面積的不斷擴大，便出現了專門負責管理灌溉系統的人。通過灌溉系統的集中管理，逐漸發展出最初的統治階層，文明由此產生。另一種理論認為貿易在文明的發展中起着決定作用。在生態多樣化的地區，要獲得稀少的資源，就需要貿易機構來組織貿易，這樣就需要某種中央集權的形式。最後一種理論認為宗教信仰是動員群眾集體參與建造水利系統、在族群爭奪資源或組織區際貿易上的最有效手段，因而廟宇和巫師是中央集權的最高形態，對於文明的形成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古文明的出現和相互間的分別，是自然條件的不同及人類主觀選擇的結合，亦即是中國傳統所說的「天人感應」過程的結果。地球上不同地域的早期人類在文明時代到來之前，對轉變中的自然環境，在物競天擇的規律下，都曾作出不懈的努力，適應自然變遷以謀求自身的持續發展。當時的成功選擇（合乎自然的行為），往往是個集體性的選擇，或集體意志的表達與執行，而它的最有效的媒介就是宗教。因此「天人感應」一詞中的人，是指集體的人，不是個別的人，而集體能在行為選擇中統一意志和行動，依靠的往往是「神」的旨意，即宗教的權威。同時，宗教不但有「神」的權威性，亦體現了自然本身，往往是神化了的自然力量。這些集體決定或意志體現的就是上述的人類社會權力的集中而它所依賴的就是自然力量。因此文明的過程，是人類由一小群人走向大集體的過程，也是從簡單的對自然恐懼與敬畏走向系統化的世俗與宗教控制的集中過程。

我們按照上述理解，將「文明」放在「文化」之上，亦即「文明是更高的、更宏觀的、放大了的文化」。當一個人類群體或社會的「文化」發展到一定成熟程度，滿足一定的條件時，一如上文提到的要達到「有城市的」、「識字的」、「更複雜的」，權力更集中的社會時，大概在青銅時代（公元前 3000 年—前 2000 年），世界上一些社會才進入「文明」。

由「文化」發展至「文明」，至「文明」的消失的全過程，西方學者奎

格利（Carroll Quigley）把它分為七個階段：混合、孕育、擴張、衝突、普遍帝國、衰敗和入侵。弗里德（Moton Fried）從社會政治學的角度，把人類達到文明社會這一歷程分為由低至高的四個發展階段：

1. 遊獵及採集團夥；
2. 農牧混合氏族；
3. 酋邦式複雜社會，出現了王、貴族、自由民、農奴和奴隸階層；
4. 文明社會，有更複雜的社會階層、分工和有組織的官僚管治體系。

文明與城市：城市的興起是文明形成的基礎

在諸個界定文明的標記中，城市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城市和文明的關係十分密切。蘇比（Sojberg, 1961）在他的《前工業城市》一書中第一句便說：

城市 and 文明是不可分割的：城市的出現和推廣，使人類離開了原始社會階段。同樣地，城市也能使人類建立一種越來越複雜，且更使人滿意的生活。

城市的出現，即人類的主要居所由原始農業聚落進化至城市，是一個由原始文化進入文明的複雜過程，它包括了人類群體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組織上的劇變。在這個過程中，原始文化走進了較高的發展階段，成為文明。從科學角度看，歷史上城市的出現，乃基於兩大因素：一是科技的突破，即生產技術、運輸技術和倉儲技術的重大發展；二是組織和管理能力上的突破（豪瑟，Hauser, 1965；莊臣，Johnson, 1967；梅多斯，Meadows, 1957）。這兩大動力使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能生產出生產者自需以外的剩餘糧食，而這些剩餘又能有效地集中到某一些空間點或地方上，形成一個



以第三產業和行政、組織與宗教功能為主的人口較多的大型聚落（特納，Turner, 1949）。

英國學者柴爾德（Childe, 1936, 1952），稱這個推動城市形成的過程為「城市革命」，它與在時間上更早的「新石器革命」或「農業革命」組成了人類由原始文化進入文明的二大階段性變革。他指出：文明的出現與城市關係密切，甚至是由城市所帶動的，而城市也等同是文明的代號。亞當斯（Adams, 1966）則論斷城市文明出現的動力乃灌溉農業、頻繁的戰爭，及地區資源分佈的不平均。布雷德伍德（Braidwood, 1986）也認為導致城市的出現乃糧食生產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公元前 4000 年在兩河流域灌溉技術的出現。大型灌溉工程的建造和管理，令對主要生產要素——肥沃土地的擁有出現不平等現象，直接促使社會階級分化。

在上述學者的基礎上，費根（Fagan, 2001）作出如下的總結：「考古學家將文明當作一個城市化的國家級社會的縮寫版。」他並對遠古文明或前工業文明，綜合出五個主要標記或指標性標準：

1. 以城市為基礎的社會組織和複雜的社會；
2. 基於中央集中的資本積累及社會地位由朝貢與稅收所決定的經濟體，支撐千百名脫離糧食生產的非農就業，促進遠途貿易、勞動分工以及手工業的專業化；
3. 有記錄方法、科學和數學的進步，以及文字；
4. 宏大的公共及紀念性建築；
5. 有一個由統治者領導的有廣泛影響的全社會性的宗教。

曼恩（Mann, 1986）從另一角度描述了「城市革命」或文明形成的過程及其具體內容。他說：真正的城市生活是由四種社會權力所構建的，即經濟、意識形態、軍事及政治。在公元前三千紀，農業進步導致經濟資源的增加，也促使了軍事力量的建立。在早期，這力量主要是對外的，而不是內部的徵稅或鎮壓工具。經濟精英和廟宇關係密切，也和文字記錄能力和遠途貿易相關。軍事力量最後促使已經控制了宗教的經濟精英蛻變為世

俗的王。最終王將自己神化，並把這四種社會權力集中於一身。兩河流域及古埃及城邦時期的興起與演變印證了曼恩的論點。

然而，對於城市的興起，在西方學者間存在不同的看法，它主要源於兩類問題：（1）城市作為文明的標記，是否先有文明，後有城市？（2）既然是生產技術的起飛與貿易的發展導致經濟結構轉變，造成社會內生產與非生產活動人口的分化，形成「城市革命」的動力，那麼這動力是否乃工業化和商業化，因而是手工業者或商人，而不是一般的經濟精英、軍事或宗教領袖成為這過程的主要人物？

芒福（Munford, 1961）為我們提供了這些問題的部分答案。他認為從分散的農村經濟到高度組織化的城市經濟的轉化，最關鍵的因素乃是王。在文明出現所依賴的經濟剩餘價值的集中過程中，「城市」是產生這些剩餘價值的科技和管理組織等關鍵投入的集中地，因而也就是當時文化要素的集中地。而主導這個城市功能的乃是以王為代表的社會及其組織結構：「王佔據了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體的磁極，把一切新興力量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臟地區來，並置諸宮廷和廟宇的控制之下。」

明顯地，這個文明觀是將城市與鄉村看做同質的，是一個體系中的不同組成部分。雖然城市在表面上與農村明顯不同，如它在經濟上以非農活動為主，在景觀上有宏偉的宮殿與廟宇，在職業功能和社會階層上有國王、官員、商人和手工匠等，儼然自成一類「文明」。但城市中的這些文明要素，是文明空間的集中，而不是與它所處的廣大的農村腹地內的農村地區相對及不同的另一種文明。套用芒福的話：城市是文明的心臟地區；王或王權是當時的文明的簡寫；是當時的文明促進了整個廣大地區農業生產力的提升、剩餘價值的積累、集中和轉化（包括製造新器物、藝術，和通過貿易換取本地缺乏的器物）。芒福又指出：與城市發展有密切相關的工業化和商業化，只是一種附屬的現象，因為它們實際的操控者乃是王權，或王權與宗教的結合體。

不過，范德·米洛普（Van De Mieroop, 1997）認為：「國家是城市基礎之上構建的」，是先有城市，才有國家及文明。因此，我們要在遠古聚落與文明出現之間加添一種近似城市的過渡性大型聚落，即在文明出現之前的



「初城」，它們為真正城市文明的形成及出現提供了必要條件。古埃及、兩河流域和中國的考古都印證了前文明時期「初城」的存在。正因如此，文字與國家，是由近似城市的大型聚落「初城」所孕育的。它，一個超大型的聚落或酋邦的首都在文字和國家出現之前已出現，在時間上正處於文明的前夜。此外，正如前述，我們不能把城市從它所處的社會和地區分割出來，從文明的角度看，城鄉是個統一體。在這些意義上，「文明」可與「城市文明」畫上等號。

總言之，城市是文明的門檻，也是文明主要的載體，是行政、教化、非農經濟活動等的支撐點，也是為農村人口和農業提供必要服務的中介地。歷史上的城市演變因而體現了文明的演變。

文明、城市與歷史

狹義的看，人類的發展要到有成熟的文字後才能夠被清楚和準確地記錄下來，成為歷史。在這之前，即史前，人類社會發生的事情，只能通過傳說或考古文物及相關推理來了解，因而一般不被認為是歷史的一部分。然而隨着考古新發現的湧現，人類擁有的史前社會和文明的發展的資訊愈來愈多，令我們可以重構史前史，使它也成為歷史的重要部分，令我們能夠更深切地了解過去，即我們從哪裏來，我們的身份是怎樣逐漸形成的。

文字的出現和應用更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分辨一個社會是否已跨入文明的主要標準，也即是分別「文明」與史前文化的主要標準。然而由原始的，表達擁有權和簡單數目的刻劃符號，經過以象形為主要的表意方式的早期文字，到成熟的記事文字，中間有一個千年以上的長過程。兩河流域契刻在泥板上的原始楔形文字大約在公元前 3500 年出現，但成為成熟的記事文字，應用於行政、律法、重大事件、王世系、文學創作等方面卻是在公元前 2100 年後。如現存的王世系及最早的烏魯克第五王的傳奇故事（吉爾伽美什史詩）的成文時間都遲至公元前 14 世紀。



古埃及象形式的刻劃符號也早於公元前 3200 年出現，主要是王的名字和物品的類型、數目和所有者的憑證；最早出現的一句句子是在公元前 2740 年。而成熟的聖書體，即在廟宇和王陵石壁和石棺上的超渡法老或其王后的陵墓文書，也只是在公元前 2133 年後中王國時的事。現存的不同版本的王系也都是在公元前 13 世紀時契刻的。古印度河文明亦出土了公元前 2200 年的刻劃符號，而在同一器物上出現達八個符號的也只是一例。它們至今仍未能被解讀。有關古印度河文明是否存在，後世傳說也缺乏。換言之，中國之外的三個古文明，除古印度河文明不存在狹義的歷史外，古埃及與兩河流域的可信歷史也只是從公元前 13 世紀才開始的，之前的歷史都是考古學者在 20 世紀後據考古文物推估的，存在很多爭議和不同版本（薛鳳旋，2019）。

中國跨進文明的時代是龍山時代，時間與古埃及和兩河流域進入文明的時間基本一致。我國最早有當時詳細文字記載的朝代是商代（公元前 1600—前 1040 年），時間也和這兩古文明現存的可證的最早文檔在時間上相當。在中國，這些現存的最早的已十分成熟的記事文字乃晚商王室特別檔案館（殷墟）出土的占卜甲骨文。這批文字記錄了包括夏代的首位帝王禹及晚商對由夏代（公元前 1970—前 1600 年）起的歷代商王的祭祀，和晚商時有關天氣、人事、地區狀況和不同事物的占卜。同時，商代更可能已流行寫在布帛、竹簡和木牘上的甲骨文或其簡易書寫體的文字。這些文字或已在之前經歷了約一千年的發展，如零散地在陶片上出現的以毛筆書寫，或在甲骨和陶、玉石器上契刻的個別字或符號。

據周代整理的古代政府文告與政策的專輯《尚書》說：「唯殷先人，有冊有典。」「冊」就是用竹或木片串起來的記事文牘，「典」乃重要的文獻或負責記錄與存放這些文獻的官員。而冊與典二字亦在甲骨文出現。只因這主要記事的載體（竹或木片）容易腐爛而失存。遺留下的只有王室占卜之用的、刻在甲骨上的特殊功能文書。因此中國的可信史（或狹義的歷史）最遲是在公元前 1300 年出現，亦有可能在早商或夏初（公元前 1970 年）已出現了。

從現有資料看，文明在東西方的出現，都約在公元前 3000 至前 2700

年，但在這之前已出現氏族社會的環壕聚落和酋邦時期的酋邦聯盟的「初城」。由「初城」孕育了真正的城市與文明，讓史前文化跨入了文明時代。在文明時代，城市仍然是最發達的地方，是文明要素的集中地。在進入歷史時期後，城市更是一國的政治、宗教、行政和經濟中心，也是典籍、文化、藝術創造與儲存之所。由於天氣和載體易腐爛的原因，我們對史前文明與更早的史前文化的認識，在傳說之外，靠的往往是城市考古。由於近五十年的考古的新發現及學界對它們的研究與解讀，我們對人類文明史，特別是中華文明史的理解，已經推前至公元前 6000 年。這也是中國城市文明史的起點。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Toynbee，一系列，在 1934 至 1962 年出版）認為：歷史學界盛行的根據國別或以國家單位來研究歷史的做法是不合情理的，歷史研究的基本單位應該是比國家更大的文明。應該把歷史現象放到更大的範圍內加以比較和考察，這種更大的範圍就是文明。因此對歐洲歷史的理解，我們要從基督教或西方文明入手，因為歐洲不少國家都是在近數百年才逐漸形成的，而它們的邊界在近百年來經歷了多次重大的變更。文明是具有一定時間和空間聯繫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時包括幾個同樣類型的國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其中文化構成了一個文明社會的精髓。同樣地，中華文明是從龍山時代逐步在多個主要地區文化的基礎上融合而成的。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中華文明，自夏代起至清代，亦不斷地融合周邊文化而持續發展。從文明史的角度看，南北朝、五代十國和南宋，中華文明的核心和中央王朝的覆蓋範圍有很大的變化和縮小，但中華文明，特別是其核心文化（儒家思想）的覆蓋卻有所擴大。中國歷史亦應涵蓋這更大的範圍。

這就是我這本《中國城市文明史》的寫作目的：以城市和文明作為主軸，從新石器中晚期中華大地出現滿天星斗的眾多地方文化開始，延至今天提出全球性的「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發展思路，以介紹中華文明發展的全過程。



文明的分類、文明的衝突與衰退

一、大河文明 / 原生文明

綜合前述，大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約公元前 3000—前 2000 年），在北緯 20 至 35 度的東北非、中東、東亞和南亞的大河流域，灌溉農業的出現促進了社會與科技的成長與進步，使一些史前文化跨入了文明時代，形成了原生的四大文明，即：中華文明、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和古印度河文明。這些基於河谷平原農業經濟為主的定居的古文明有一定的穩定性、持久性和保守性，被稱為大河文明。有些西方學者卻把所有新石器時代文化都視作古文明，如不少美國學者就把中美洲和南美洲一些石器時代文化視為古文明，事實上它們在社會與科技進步等考慮上仍沒有達到文明標準。現今仍存在的原生文明只有中華文明。其他三大古文明早已在文明的衝突或衰退中消失了。

二、海洋文明 / 次生文明

然而原生文明通過它長期的擴散，已催生了不少次生文明，如希臘文明是兩河及古埃及的次生文明，日本文明是中華文明的次生文明，美國文明是歐洲的次生文明等。這後三者亦因其海島和大洋邊沿的地理位置及缺乏廣大河谷平原的地理環境，傾向一個顯著的與大河文明不同的發展方式，即利用海洋航行的便利，通過強化對外貿易、殖民與搶掠，達到更快速的財富集中，以致經濟與領土的擴張，展現了積極的、掠奪性、功利性和強烈物慾的特點，被稱為海洋文明。在大航海時代之後，歐洲國家通過船堅炮利的強勢在歐洲以外各大洲搶佔殖民地，使西方文明，亦即海洋文明（中國一些學者稱為藍色文明）成為世界近二百年的主導性文明。

三、「文明衝突」與「文明衰落」

歷史上文明的起落與盛衰引起了學者對文明演變的興趣，一些西方學者提出了「文明衝突」與「文明衰退」等論說。德瑞克·詹森（Derrick